

李达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读《纪念李达诞辰一百周年》

王 玄 武

1990年10月李达百岁冥寿时,为了缅怀这位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中国现代哲学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在广州、冷水滩、北京、长沙、武汉等地先后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撰写了有关李达一生行迹各个侧面的纪念文章和学术论文,召开了纪念大会、学术讨论会、座谈会。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纪念李达诞辰一百周年》(以下简称《纪念集》),就是这些纪念文献和学术论文的结集。它既是对李达的隆重纪念,又是对他研究的新著。由于本书编选的宗旨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双百方针,各抒己见,推动研究,繁荣学术,因而这本新著不仅在体系结构上层次分明,安排得当,大体包括题词与纪念专文、总体评价、专题研究和文史纵横,以及纪念活动综述;而且各篇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尽相同,翔实而鲜明地反映了李达一生的革命实践活动和学术成就,论题广泛,内容丰富,具有求实、求真与不拘一格的特色。本书以“中国现代哲学与文化思潮(续集)”作为副标题,旨在说明读者从这本书中,不仅可以获得对李达的深入和全面的了解,而且通过对这位中国现代哲学与文化思潮中马克思主义主流派著名人物的纪念和研究,也能从一个侧面探索中国现代哲学和文化思潮,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风貌。

本书对李达的纪念和研究,既有按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活动作纵向论述的,也有按他的代表作和所表现出来的品格作专题论述的。就其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他在政治实践、理论研究、教学和教育工作三个方面的活动情况。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李达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方面所进行的工作,这是大家知道的。他参加共产党的上海发起组,随后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和党的“一大”的筹备和组织工作,并作为上海小组代表出席党的“一大”,被选为党中央的宣传主任;他担任我们党第一个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的主编,同时又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进行党的知识教育,并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他创办并主持我们党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他主办我们党第一个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上海平民女学”,并为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工作对我们党的创建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纪念集》中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等文章,对李达在我们党创建时期的活动和贡献进行了论述,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在理论活动方面,李达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他在日本学习时,就开始学习马列著作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在国内发表多篇论文。1920年8月从日本回国后,他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又翻译了多种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全国解放后,他继续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和宣传,撰写了一系列著

作和文章，主持编写了《唯物辩证法大纲》。在将近半个世纪的理论活动中，他终身笔耕不辍，撰译的马克思主义论著卷帙浩繁，达数百万字，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及其他学科领域。他的论著，培养和影响了一批又一批革命者和学者，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用和发展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对于李达所翻译和撰述的著作，在《纪念集》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一代宗师》一文中，则按年代分别作了介绍和评述，给人以全面而系统的认识。

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中，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中国化方面的贡献尤大。他所译的《唯物史观解说》一书，于1921年在上海出版后，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启蒙读物，广为流传，久销不衰。被毛泽东称赞为“译得很及时”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一书，是30年代在我国影响最大的苏联三部哲学译作的第一部。毛泽东读了这个译本的两个印本，写了1万3千多字的批语。李达撰述的大量哲学著作，更是作出了有影响的贡献。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是李达多年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总结，也是李达的第一本专著。它反映了年青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所达到的水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深入分析和研究这一著作，对于正确认识中国现代唯物史观发展史的实质、特点和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纪念集》中的《〈现代社会学〉》评述和《论〈现代社会学〉哲学思想及其代表意义》，对这一著作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评价了它的理论价值与历史意义，并通过对它的研究提出了如何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几个特点，给人以启迪。《社会学大纲》是李达的代表作。它最先由北平法商学院作为该校的教材印行，两年后于1937年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这部哲学名著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化的教材体系，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以作者当时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在一些基本观点上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毛泽东称这本书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于这部著作，《纪念集》中也有一组文章进行研究。在《论李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从〈社会学大纲〉看李达的哲学思想》和《论〈社会学大纲〉对矛盾学说的阐述》等文章中，对李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所作的贡献进行了多方面探讨，并提出了作者的研究心得。李达建国初期撰写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曾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对此，《纪念集》中也有反映。《从毛泽东三封信看建国初期李达的哲学成就》和《重读“两论”〈解说〉》等文章，论述了李达在宣传、解释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所做的工作。对于李达在哲学领域里的成就及其特点的研究，除了上述对李达的代表性哲学论著进行研究的文章之外，还有一组综合性研究的文章，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泰斗》、《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李达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及其方法论启示》等。这组文章评价了李达的哲学成就，概括和分析了他的一些具有创见的哲学观点。从全书来看，研究李达的哲学论著及其观点的文章相对多一些，这是与李达在哲学方面的卓越贡献相适应的。

李达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是一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撰写的《经济学大纲》和《货币学概论》，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学说，是当时我国最系统最完整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重要著作。《经济学大纲》在30年代铅印后，毛泽东读了多遍，并向延安理论界推荐。李达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过程中，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以及当时中国经济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进行解剖和分析，撰写和发表了有关专著和文章，正确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纪念集》中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在中国的播种者和耕耘者》和《〈中国产业革命概况〉述评》等文章，论述了李达在经济

学领域的贡献，分析了李达在他的经济学著述中所阐明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道理和一些政策主张的意义。

对于科学社会主义，李达进行了全面研究和介绍，并建树了卓著的理论实绩。他撰写了一系列有关论述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内容的文章，其中尤以《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社会革命底商榷》和《马克思还原》等文章见重于当时中国论坛。他在这些著作中，不仅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和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革命，正确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并且结合中国革命早期的斗争同各种错误思潮和观点进行了论战。在《李达早期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杰出贡献》、《建党前后李达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贡献》等文章中，充分肯定了李达在为中国早期科学社会主义的启蒙和传播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李达所耕耘的范围极其广阔，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外，在法学、伦理学、史学以及其他理论领域，也有许多开拓性的著作，或者提出了一些开拓性的见解。在法学方面，1928年，他出版译著《法理学大纲》，1948年他在湖南大学法律系任教时，又撰写并石印《法理学大纲》，开辟了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法学的新路子。全国解放后，他曾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及新法学研究院副院长等职务，撰写了《谈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讲话》等论著，对我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法理学大纲》是他的法理学即法律哲学的代表作。在道德理论方面，李达也有新的建树。他在有关的著作和文章中，对道德的本质和作用、道德的起源和演变、道德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人类各个历史时期的道德特点以及无产阶级新道德等方面，都有创造性的论述。在这本《纪念集》中，《李达的法律哲学初探》和《李达的道德理论初探》两篇文章，对《法理学大纲》中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法律哲学的基本思想以及李达的道德理论，都进行了专门探讨。本书不足之处，是疏漏了有关研究李达在史学和妇女运动等方面成就的文章。

李达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是享有盛名的教育家。解放前他创办过小学、外语学校、平民女校，担任过湖南自修大学的学长，并长期担任大学教授，解放后，则先后担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他在长期的教学与教育实践中，坚持教学与科研并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因而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开设的课程和所编的教材，都深受欢迎。在办学中，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党的教育方针，把学生培养成为又红又专的全面发展的人才。他十分重视在学校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重视教学质量和师资水平的不断提高，并在教学组织机构的调整、课程设置、教材建设、师资培养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付出了大量的劳动和心血。《纪念集》中的《李达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与《殚精竭虑改造与建设湖南大学》等文章，探讨了李达的办学思想，介绍了李达按照新的教育原则和教学方法，探索和实践全面发展教育的详细情况，有助于对李达在教学和教育工作中的办学主张和贡献的进一步了解。

李达不仅在为我们党的创建、理论研究、教学和教育活动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卓越的业绩，而且在品格和风范上也为我们作出了榜样。

贯穿于李达一生中的一条红线，就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贞不渝的精神。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曾信奉过“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政治主张。但是，当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之后，就矢志不渝，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即使在国民党统治下，在遭受跟踪、迫害、通缉的险恶环境中，他也一如既往，从来没有中断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述和教学，始终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断前进。李达的这种

对共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不移的精神，在《纪念集》的《论李达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坚定性》、《学习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忠贞不渝的精神》等文和对一些与李达有历史关系的人士的访谈录中，都有详尽论述。

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是李达理论活动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如前所述，李达在理论撰述中不仅坚持按照马克思主义本来面目宣传马克思主义，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准确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密切结合中国国情的研究，着力探求具有中国特殊性的社会改造理论。他以唯物史观作为自己哲学研究的起点和重点，正是为了运用这个武器去认识中国社会，研究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他在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经济结构、阶级结构以及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动力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的基础上，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得出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的结论。从《纪念集》的《简论李达唯物史观研究的基本特点》和《论李达对国情的研究》等文章，可以看到李达对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个马克思主义原则的理解和运用，看到他在将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的所作的可贵的探索。

李达还具有坚持真理、言行一致的品格。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不仅表现于他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渊博知识和高度修养，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而勤奋研究，而且表现于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贯彻到自己的言行中去。一方面，他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揭露和批判从不含糊，充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战斗精神。另一方面，他又勇于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剖自己，锤炼自己，对自己进行自觉的清算。《纪念集》中的《学习李达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精神》和《建党前后李达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等文章，根据李达发表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无政府主义之解剖》和《第三国际党大会的缘起》等一系列战斗檄文，论述了他在五四时期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所开展的对无政府主义、假社会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第四国际极左思潮的批判，以及他在历次论战中所表现出的一些突出特点。他在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而进行的斗争中，不仅观点鲜明，敢于同权威性人物进行论战，而且坚持说理斗争，依据不同的对象而区别对待。李达对“顶峰论”的批判，表明他在晚年仍然坚持这种对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毫不迁就的精神。我们缅怀和纪念李达，就要以这位先驱为榜样，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忠诚于马克思主义。

（本文责任编辑 邹惠卿）